

鲁迅作品选读 自学参考资料

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组

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翻印

一九七六年八月

毛主席论鲁迅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

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

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冰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目 录

毛主席论鲁迅

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1
鲁迅生平简介·····	1
鲁迅杂文概述	
鲁迅小说概述	
鲁迅论文艺批评·····	96
鲁迅论自己的创作·····	105
鲁迅著作简介·····	126

鲁迅生平简介

(一)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城的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由于他外婆家在乡下，有机会接触农村，知道农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后来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又有机会接触工人，了解矿工过着“鬼一般工作着”（《琐记》）的非人生活。因此鲁迅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而对于腐败没落的本阶级则十分憎恶，这是他坚决背叛本阶级，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

青少年的鲁迅，生活在一个黑暗、混乱、人民痛苦不堪的年代。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奋起反抗，相继爆发了太平

天国和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在卖国贼、投降派和帝国主义的勾结下，被血腥镇压下去。这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向四方寻找真理”，以期有所改良。那时他们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却连改良主义的“维新”也不允许，所以倡导“维新”的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

一八九八年，鲁迅十七岁，开始选择人生道路。他鄙视封建统治阶级的科举“正路”，不怕社会的“奚落”和“排斥”，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到南京去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读书时，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给他影响最深的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从这时开始，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化论在他思想上占着主导的地位，同时“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

一九〇二年，鲁迅抱着“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愿望，到日本留学，遂决定学医。可是，这种“维新”救国的“好梦”，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鲁迅偶然在时事电影片上看到一个中国人

给俄国军队作侦探，被日本军队捉去砍头，围着看的中国人，他们体格强壮，精神却麻木。这使鲁迅感慨很深，于是又弃医学文，提倡新文艺。（见《〈呐喊〉自序》）从此，鲁迅便以笔杆子作为武器，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就是他在日本时立下的战斗誓言。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迷信改良主义的维新派暴露了不彻底的弱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这批人集中在日本，鼓吹民族和民主革命，同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鲁迅站在民主革命派一边，与革命党人交往颇密，并参加了反清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活动。同时为留学日本的学生所办的杂志撰稿，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批判了只学皮毛、照搬西方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他这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猛烈抨击保皇的谬论，宣传爱国主义，主张用反抗精神同旧思想旧势力作不妥协的抗争，使国民从封建专制及其腐朽的“精神文明”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对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起了激励和促进的作用。

一九〇九年，鲁迅回国，先后任教杭州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继续和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一九一

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鲁迅极其兴奋激动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并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演讲，宣传革命意义。次年南京政府成立，鲁迅应邀任教育部部员，不久随政府迁往北京。

可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所举行的“二次革命”又宣告失败，接着是袁世凯改称帝制（一九一五）和张勋阴谋复辟（一九一七），革命不过改换招牌而已，“内骨子是依旧的”，鲁迅因而感到失望。后来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序言》）。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前，他沉默了一个时期，潜心于辑录古书，搜集、研究金石碑帖。

从南京求学到五四运动前夕，其间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鲁迅还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能理解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现象，但他在摸索中国人民解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呼啸前进。

（二）

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

命的鼓舞下，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鼓舞着中国人民，也鼓舞着鲁迅。他清醒地感到，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革命成功了，俄国被压迫的“下等人”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为世界和中国人民指出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以，鲁迅赞颂十月革命为“新世纪的曙光”（《圣武》）。在这曙光的照耀下，他象暴风雨中的海燕，英勇地坚决地投身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和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一道，代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哨阵地《新青年》中的坚定左派，猛烈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开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鲁迅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参加五四运动的。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自选集〉自序》），提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和白话形式相结合的文化革命，坚决反对“思想照旧”、“换牌不换货”（《渡河与引路》）的倾

向，和当时追求形式主义改良的胡适之流的所谓“白话文学”根本不同。他在五四前夜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猛烈地攻击了中国社会人吃人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这是五四反封建文化的第一声春雷，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五四以后，他继续写了许多小说，收集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里，深刻地反映和批判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真实地描绘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人物形象，举世闻名的《阿Q正传》，就是其中的一篇。这一时期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和其他杂文，更是象匕首投枪一样，揭露封建愚昧，针砭社会锢弊，为彻底摧毁罪恶的精神文明和孔家店在中国的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出现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革命的深入发展，五四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而鲁迅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高举继续革命的旗帜，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主张痛打“落水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中国人

民对敌斗争的十分宝贵的经验。这时期他同五四运动中的右派胡适之流和鼓吹复古的“学衡派”、“甲寅派”，特别是对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宣扬买办洋奴思想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正人君子”们在鲁迅的揭露和打击下，要求“带住”，鲁迅的回答是：“我还能‘带住’”！充分表现了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是鲁迅前期的战斗业绩真实而生动的记录，此外他还写了散文诗《野草》，深入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而《中国小说史略》则是我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鲁迅在这时期还先后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任教，接触了广大的青年，热情地关心他们的成长，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

(三)

鲁迅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严于解剖自己，因而使他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开始动摇以至完全抛弃。促使这种转变的有两件大事，那就是一九二六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和一九二七年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广州“四·一五”大屠杀。

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肆意屠杀捍卫祖国主权的爱国青年。“血写的事实”，使鲁迅认清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互相勾结、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狰狞面目；对他们的斗争，除了“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之外，别无他路。由于鲁迅为遭杀害的革命群众伸张正义，对制造血案的反动派大张挞伐，因而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教了几个月书，在那里写了回忆往事的散文《朝花夕拾》。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开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鲁迅来广州是因为向往革命，希望与郭沫若等所创办的创造社“联合起来”，

“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两地书》六九）。可是鲁迅到达广州时，创造社的成员相继离去，这一愿望，终于没有实现。这时正是北伐战争，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助长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气焰，一九二六年三月就发生了国民党右派阴谋夺取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鲁迅一到广州，就察觉到这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通信（并Y的来信）》）、

“四·一五”大屠杀完全证明了鲁迅观察的正确。

鲁迅处在革命深入发展而阵营开始分化的关键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时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会见过中共两广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同志，后来被国民党屠杀的中大党员学生毕磊经常访问他，送他党的刊物。鲁迅在党的影响下，提高了觉悟，对党竭诚拥护。那时正是以共产党为中坚的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他恳切地勉励中大师生“坐着工作而永远记着前线”（《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天后，广州也发生“四·一五”大屠杀。中山大学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鲁迅当日冒雨赴校，并召集各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于是愤然辞去中大一切职务，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

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态度鲜明，立场坚定，随时有被迫害的危险，但他毫不畏惧，多次与友人通信，尖锐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血腥罪行。应邀出外讲演，提醒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读书杂谈》）；借古慨今，评曹（为著名的法家曹操翻案）刺蒋（《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

关系》)。面对着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使鲁迅认清了反动派的阶级本质及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不断克服他相信进化论的思想局限，深深感到“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痛切地告诫革命人民：“防被欺”（《小杂感》）！

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鲁迅一生思想转变的重要关键，而“四·一二”则是鲁迅的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起点。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在反革命屠杀中“轰毁”了！从此明确地意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这就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扫除了障碍。他在这时期所写的杂文《而已集》和《三闲集》的部分作品，以及新发现的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清楚地表现了鲁迅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

（四）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鲁迅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绞杀革命，对革命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鲁迅在反革命“围剿”中，不怕国民党的迫害，特务的盯梢，叛徒的告密；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革命的激流，领导坚定的左翼作家，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粉碎蒋介石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一九二八年，上海文化界展开了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大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们的立场、世界观并没有根本转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是“朦胧”的，只是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挂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招牌，对鲁迅进行宗派主义的攻击。在这之前，鲁迅在《革命文学》等文里已指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正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样。所以鲁迅在《三闲集》里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作家一旦把握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写出来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的错误理论给予了驳斥；坚决反对他们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似是而非的种种论调，为中国早

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鲁迅为了弄通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历史唯物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论中国革命问题》等。还亲自翻译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体会到马克思主义“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的信）使他“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鲁迅不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来打击敌人，而且善于用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批判了阻碍他前进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比喻为“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因此，鲁迅终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跃进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当时上海的进步的文艺界为了团结对敌，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是“左联”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成员之一，在成立大会上，他提出了“左联”的战斗纲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